

Some Issues about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关于中共六大的几个问题

白云涛 Bai Yuntao

中国国家博物馆, 北京, 100006

内容提要:

中共六大是在大革命失败后, 党在城市和农村革命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 中国共产党重新整集队伍, 在新形势下探索革命道路, 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要转折时刻召开的, 是唯一一次在国外召开的代表大会。本文在吸收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依据最新六大档案文献资料, 就大革命失败后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党内处分、六大为何在莫斯科召开、六大代表产生、共产国际对中共六大的指导、六大期间的党内争论、共产国际和向忠发当选总书记的关系、六大期间共产国际对毛泽东井冈山革命斗争的认识等问题, 进行系统的梳理和阐述, 以形成完整的历史链条。

关键词:

中共六大 瞿秋白 周恩来 张国焘 布哈林 向忠发

Abstract: The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CPC) was held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Great Revolution, when revolutionary force in both urban and rural areas had been crushed and the CPC re-assembled forces to explore revolutionary road under new circumstances, marking the CPC's independent leadership in Chinese revolution. It is the only national congress held outside China. This paper is based on previous research findings and the latest historical archives. Comprehensive explanations are given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disciplinary action within the CPC on Mao Zedong and Zhou Enlai after the failure of the revolution, the reasons for holding the Congress in Moscow, the election and appointment of delegates, guidance from the Communist International (Comintern), debates within the CPC during the Congress, Comintern's influence on the election of CPC General Secretary, Comintern's understanding of struggles in the Jinggang Mountains led by Mao Zedong, etc.

Key Words: 6th National Congress of CPC; Qu Qiubai; Zhou Enlai; Zhang Guotao; Nikolay Bukharin; Xiang Zhongfa

1. “左”倾盲动错误和毛泽东、周恩来的党内处分

1927年8月7日召开的中共中央紧急会议，选举产生了由苏兆征、向忠发、瞿秋白、罗亦农、顾顺章、王荷波、李维汉、彭湃、任弼时组成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临时中央政治局选举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政治局常委，瞿秋白主持工作。

按照八七会议确定的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方针，以及把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作为当前党的最主要任务的决定，各地党组织纷纷发动起义。1927年9月9日，毛泽东发动湘赣秋收起义。9月底，杨善集、冯白驹等发动海南琼崖起义。10月底，彭湃发动广东海陆丰起义。11月中旬，湖北省委发动黄麻起义。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周文雍、叶剑英发动广州起义。虽然由于准备不足，以及严重的敌强我弱，导致大部分起义失败或遭到挫折，但是这些起义英勇回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疯狂屠杀和围攻。

中共领导起义，开展武装斗争，实现了中国革命斗争形式的转变。然而，在共产国际“左”倾理论指导下，临时中央错误地估计形势，党内的“左”倾情绪迅速滋长起来。

1927年10月下旬，国民党新军阀李宗仁与唐生智之间爆发宁汉战争。10月底，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认为，革命潮流高涨，全面夺取革命胜利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

1927年11月9日至10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由瞿秋白主持，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参加。会议通过罗明纳兹起草的《中国现状与党的任务决议案》。决议案认为国民党新军阀的统治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党要实行全国武装暴动总策略：农村暴动同城市暴动相结合，以城市暴动为中心，形成城乡武装总暴动，一举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全国苏维埃政权。会议对八七会议后遭受失败和挫折的各地武装起义不作具体分析，而是实行惩办主义，给予领导者严厉的批评和处分。南昌起义后，按照中央部署，起义部队向广东进军，准备到广东后重树北伐旗帜，北伐以蒋介石为首国民党新军阀。由于部队酷暑远征，加之敌强我弱，部队减员很多。至8月7日转战至江西抚州临川，总兵力由起义时的2万人锐减至1.3万人。再经三个月转战，至11月初仅剩2000多人。周恩来、贺龙、李立三、叶挺、谭平山、张国焘脱离部队辗转转到上海，朱德、陈毅率余部向湘赣边界的井冈山转移，于1928年4月与毛泽东会师井冈山。对于南昌起义后的挫折，罗明纳兹指责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起义前敌委员会执行的是“机会主义的旧政策”，“在政治上及策略上并未能真正代表工农”，是“软弱的军事投机”。据此，在罗明纳兹建议下，临时中央给予周恩来为首的前委全体成员，包括李立三、张国焘、恽代英、彭湃等人以“警告”处分。对于谭平山，因南昌起义前他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再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罗明纳兹获悉强令把他开除党籍。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原计划是由秋收起义前敌委员会书记毛泽东负责发动起义，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负责在长沙发动暴动，里应外合，夺取长沙。秋收起义爆发后，毛泽东按照预定计划指挥起义部队5000余人，分三路向长沙进军，但由于武器差和没有战斗经验，三路义军均因遭到优势敌人围攻，损失惨重。毛泽东果断改变攻打长沙计划，彭公达两次果断中止长沙暴动计划。9月29日三湾改编后，毛泽东率领残存的不足千人义军进军井冈山，于10月27日抵达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的茨坪，开创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罗明纳兹指责毛泽东和彭公达是“临阵逃脱”、“违背中央政策”，犯了“机会主义”的错误，给予毛泽东撤销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处分，给予彭公达撤销中央临时政治



图一 秋收起义时的毛泽东



图二 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

局候补委员、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处分(图一)。此次会议与会名单中要求毛泽东参加,没有要求彭公达参加。参加此次会议的李维汉后来回忆道:当时毛泽东在井冈山,可能他没有接到会议通知,就是接到了他也走不开^[1]。毛泽东、彭公达都没有出席会议,没有机会为自己的正确决策做出解释。南昌起

义领导人周恩来、李立三虽然出席会议,仍然免不掉“警告”处分。但是,此时周恩来的才干被大多数人所认可,会上决定将三名政治局常委增加到五人,周恩来、罗亦农当选。至此,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成员为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周恩来、罗亦农,瞿秋白主持工作(图二)。

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规模屠杀下,中国共产党和革命群众伤亡惨重。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群众运动的领袖,成千上万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以及党外革命人士,倒在血泊中。此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统计,中国共产党员由大革命高潮时期的近6万人急剧减少到1万多人^[2]。革命战友汪寿华、萧楚女、熊雄、陈延年(陈独秀长子)、赵世炎等,先后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出于对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愤怒,党内普遍滋生愤慨、急躁、拼命和以血还血、以牙还牙的复仇情绪。同时,在不问青红皂白惩办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彭公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情况下,一些犯过右倾错误的人,担心重犯右倾错误,认为“左”比右好,宁“左”勿右,从而为“左”倾错误的发展提供了温床。

此次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开始在各地贯彻执行“全国武装暴动总策略”。很快,强令下的严重脱离群众的农村武装起义和城市工人暴动,在各地盲目展开。由于准备不足,以及国民党势力的强大,除少数农村武装起义取得一定胜利外,其他起义和暴动有的没有发动起来,有的发动起来即遭到血腥镇压。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发动的武汉、长沙、上海、广州等大城市的罢工、暴动,损失尤其严重。由于这种“左”倾盲动错误,此次会议到1928年中共六大召开前,中共湖南省委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夏明翰,中共五大中央候补委员、中共湘鄂赣特别委员会书记郭亮,新任中共中央五人政治局常委之一罗亦农,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蔡和森夫人向警予,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许白昊,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复他,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陈独秀次子陈乔年,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长周文雍,中共两广区委妇女部长陈铁军等党的高级领导干部,先后英勇牺牲。刚刚积蓄起来的革命力量,再次遭受严重损失。

2. 确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

召开中共六大，是由党的八七会议提议的。八七会议选举产生了新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但是按照党的章程，换届选举需要党的代表大会来完成。因此，八七会议通过的《党的组织问题议决案》第二条规定：“中央临时政治局应在六个月内准备召集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前，中央临时政治局执行中央委员会之一切职权。”^[3]

1927年11月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就召开中共六大问题，通过了《关于召开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之决议》，决议“第六次全党代表大会决定于一九二八年三月初至三月半之间召集”，“大会会期和地点，由中央常委决定”，六大之前“各省党部代表会议的日期及议事程序，由各省省委议决之，函知中央”^[4]。此决议还规定了六大代表选举办法和六大的议事程序。但是，这次会议没有确定六大召开的具体时间和地点。

1928年1月12日，中共五大代表、中共五届中央委员项英，以及中共五大代表、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上海总工会党团书记许白昊和中共五大代表、上海总工会委员长郑复他，联合致函临时中央政治局，指出中共六大关系党及革命前途，万分重大，提议通告各级党部开始讨论大会问题，发表各种意见，并提议创办刊物，刊发各省党部对于大会之意见^[5]。

1928年1月18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又讨论召开六大问题。会上，瞿秋白提出在三至四月召开大会，并提出由于国内白色恐怖十分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能够保证安全的地方开会，会议地址考虑在澳门。但与会多数主张在香港召开，有的建议在苏联的海参崴召开。会上，瞿秋白布置了起草六大有关文件的工作：共青团的文件由共青团中央起草，党务组织方面的文件由罗亦农负责起草，工会问题由工委起草，土地问题和政策问题由瞿秋白起草，党纲草案由瞿秋白、罗亦农负责起草。2月13日，临时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讨论六大问题。经过讨论，决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提出正式申请，希望批准中共六大能够在苏联境内举行，同时要求共产国际执委会派代表团参加，并希望斯大林或布哈林等领导人能够出席这次大会。会后，临时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红色职工国际驻华代表米特凯维奇同时致电共产国际，正式提出在苏联境内召开中共六大的要求。

同年2月22日，联共（布）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召开会议，讨论中共六大问题，并任命米夫担任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中国部主任^[6]。随后，共产国际复电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的请求，大会可以在莫斯科举行，并指示临时中央重要领导人瞿秋白、罗亦农、周恩来等立即赴莫斯科，商定召开大会事宜。同时还要求陈独秀、罗章龙、邓中夏、张国焘、蔡和森，作为共产国际指定的六大代表，前去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3月底，共产国际关于同意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的决定传到中国。4月2日，瞿秋白主持召开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传达共产国际上述决定，并讨论大会议程、代表人数、代表出身等问题。会议决定瞿秋白代表中共五届中央委员会在六大做书面政治报告。第二日起瞿秋白即昼夜不停，奋笔疾书，于12日即写出了近10万字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党——关于1925年至1927年中国革命的报告》。

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得到了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拥护。此前，共产国际通过驻华代表贯彻对中国革命的政策和指示。这些共产国际代表对中国革命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也都犯了不少错误。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的工作有意见，斯大林、布哈林等共产国际领导人对他们的工作也不满意。同时，在有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中共高层领导之间存在着严重分歧。在茫然的现实面前，年幼的中共急需共产国际在各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

何省代表	姓名	職業	何種工人
廣東	黃敬文	工人	海員
廣東	張金	工人	機器
廣東	曹俊升	工人	海員
廣東	35	工人	海員
廣東	39	工人	油業
廣東	周秀珠	工人	機器
廣東	袁炳輝	工人	海員
廣東	38	工人	印刷
廣東	40	工人	海員
廣東	廣成志	工人	機器
廣東	唐明德	工人	機器
廣東	蔡作東	工人	機器
順直	劉玉	工人	印刷(短期)
順直	34	工人	紡織
順直	32	工人	
順直	王藤文	工人	鐵路
順直	劉玉田	工人	印刷
順直	29	海員	
順直	33	工人	紡織
順直	36	工人	礦工
順直	36	工人	礦工
順直	37	工人	鐵路
福建	許奎璧	工人	印刷
安徽	張德元	工人	
山東	黃文	工人	

图三 出席中共六大代表名单之一，由此可见工人成分居多

六大代表 75 人^[8]。由于共产国际指示要重视工人成分，工人代表要占多数，因此 75 个代表中有 41 人是工人（图三）。

2. 陈独秀、毛泽东等未能出席六大

关于中共六大的代表成分问题，周恩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指出有两点不足，一是片面注重工人成分，75 名代表中，41 人是工人，其中经过大革命锻炼的不多；二是没有把当时有革命经验并在党内享有较高声望的干部集中起来参加六大，除陈独秀外，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陈潭秋、恽代英、李富春都没能出席六大。

上述七人中，除任弼时被临时中央指定留守之外，其他六人，无论是从革命实际经验来说，还是按照党内领导职务而论，都应该作为六大代表出席六大，但为什么没有出席？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共产国际通知中共中央可以在莫斯科召开中共六大的同时，或许是担心临时中央排挤不同意见的同志，特地超越临时中央，提出陈独秀、张国焘、罗章龙、蔡和森、邓中夏为特约代表，赴苏参加中共六大。当时，张国焘因“八一起义”被罗明纳兹给予处分，八七会议后自己临时中央总负责人的地位丧失，再加上在是否进行全国总暴动问题上与共产国际和瞿秋白分歧尖锐，对共产国际和瞿秋白非常不满。他曾对陈独秀提出想另组织一个“工农党”，以摆脱瞿秋白和共产国际政治路线的约束。陈独秀“大感兴趣”，认为是“合情合理的改变党内现状的要图”。共产国际超越临时中央特邀上述五人参加中共六大，或许还有防止中共

二 六大代表的产生和留守中央的确定

1. 六大代表的产生

中共六大代表的产生，原本在 1927 年 11 月临时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确定了选举办法，但由于环境险恶，各地党组织处于地下活动和分隔状态，组织机构不健全，各地党组织很难召开党代会进行代表选举工作。同时时间太紧，3 月获得共产国际允准在莫斯科举行大会的复电，4 月代表就要起程赴苏，而这时多数省份还没有选出代表。所以，“除了广东、河南等省的代表是开会选出来的，其余大多数是中央指定的。”^[7] 经临时中央政治局指定和少数地方党组织选举，共产生包括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苏兆征、王若飞、项英、罗章龙、关向应、蔡和森、向忠发（已在莫斯科）、杨之华、蔡畅、阮啸仙等在内的

党内分裂的考虑。六大期间，斯大林曾经问瞿秋白和张国焘：陈独秀会不会另立山头，再搞起一个新的党？

邓中夏是临时中央五常委之一，首先获知共产国际的这个指示，并受临时中央委托，通知张国焘，恳切地说他不愿意看到党的分裂，劝张国焘出席中共六大。随后，同样反对瞿秋白临时中央盲动政策的项英也找到张国焘，说罗明纳兹和罗易已经调回莫斯科，据说他们受到共产国际的批评，共产国际已经认识到当时中国革命形势处于低潮，指示临时中央不要随便暴动。现在再反对临时中央，已经没有必要了，希望顾全大局，到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

张国焘找陈独秀商谈是否接受共产国际邀请，参加中共六大。陈独秀预料到中共六大中止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主张张国焘、罗章龙、蔡和森、邓中夏、项英等都去，自己则拒绝出席。张国焘说：如果先生不去，你与共产国际及中央间的关系的破裂，只是时间问题。陈独秀回答：八七会议的决议对我批评的如此严厉，足见共产国际早有牺牲我的决心。我的处境不同，即使出席，也难挽回与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的关系。陈独秀还表示：如果第六次大会成绩不错，我对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将不持反对态度，以后如果让我到莫斯科当一个政治难民，我是可以考虑的^[9]。

为了贯彻共产国际的指示，瞿秋白又派给陈独秀做过多年秘书长的王若飞，向陈独秀传达共产国际邀请他参加中共六大的指示。陈独秀对王若飞说：“八七”会议、11月会议批评我的错误时，没让我参加，也没有让我发表意见，这是不对的。我到莫斯科也只有挨骂，不能说话，因此，不会去莫斯科。最后，瞿秋白、周恩来也来劝说，陈独秀很不痛快地说：“大革命失败了，作为总书记，我自然有责任，可共产国际更有责任，我只是国际指示的一个执行者而已。我不会作违心的检讨，也没有万方有罪在予一人的雅量。”他更直言：“中国问题要由中国人自己来解决，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来领导，我要研究中国问题，为什么要到莫斯科去研究，在中国就不能研究？”^[10]

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时，在罗明纳兹指导下的临时中央已经开除了他八七会议时当选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临时中央的这个决定传到井冈山的时候，已经被误传为开除了毛泽东党籍。同时，湖南省委已经瘫痪，毛泽东在偏僻的井冈山不知道召开中共六大之事。这样一耽误，毛泽东失去了出席六大的机会。

秋收起义时接受毛泽东指令，组织株洲暴动失败的湘潭县委委员陈永清，因湘潭县委与湖南省委和临时中央都失去了联系，被县委指令和罗学瓚、刘义到上海找中共中央。3月底抵达上海，找到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恰好缺乏湖南代表，于是陈永清和刘义被指定为出席六大的湖南代表，罗学瓚则被派去浙江工作。4月底，陈永清和刘义抵达大连，被日本警察扣留审讯，陈永清伪称是江西皮货商人，日本警察到陈永清和刘义所住旅馆，勒令他们当晚离开大连。于是，陈、刘当晚乘车离开，经长春抵达哈尔滨。然后经绥芬河路线，偷越国境，至海参崴乘西伯利亚铁路到了莫斯科^[11]。

筹备六大期间，1928年3月20日，由于叛徒出卖，担任中共湖北省委党报《大江报》主笔的向警予在武汉被捕，5月1日在武汉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当时，蔡和森和向警予生的女儿蔡妮6岁，儿子蔡博4岁。蔡和森和妹妹蔡畅（李富春妻子）已经赴苏，时任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长的李富春，担负起照顾蔡妮和蔡博的任务，因而未能赴苏参加六大^[12]。

中共五大中央委员、时任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的刘少奇，1928年2月份还在上海参加临时中央谈话会，3月以全国总工会特派员的身份到天津指导中共顺直省委的工作。

刘少奇离开上海后不久，共产国际即回复临时中央可以在苏联举行六大，天津虽然离大连很近，但刘少奇没有接到参会通知，因此未能成行。时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的陈潭秋、广州起义时担任广州苏维埃政府秘书长的恽代英，情况和刘少奇一样，都是没有接到参会通知。

周恩来指出：由于上述做实际工作的重要领导同志没有参加六大，特别是没有刘少奇、毛泽东等同志参加，没能在会上多反映一些实际问题和意见，再加上会议中的失败情绪、“山头”倾向和人身攻击等，一些问题没能更深入地讨论下去^[13]。

3. 留守中央的产生

1928年4月底，临时中央政治局继续讨论六大问题。考虑到国内工作需要，政治局常委不能全部赴苏出席六大。当时，五位常委中，苏兆征因参加3月18日开幕的赤色职工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已经身在莫斯科；罗亦农被叛徒出卖于1928年4月15日被捕，21日被龙华国民党淞沪警备司令部枪杀。于是，决定瞿秋白、周恩来赴苏出席六大，另一常委李维汉和任弼时、罗登贤组成留守中央常委会，领导国内革命斗争，时年28岁的李维汉主持工作。任弼时时年24岁，时为中共五大中央委员、共青团中央总书记、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根据工作需要，六大期间增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罗登贤时年23岁，曾参加广州起义，率领工人赤卫队在前线作战，时为中共广东省委员会常务委员，此时已调入上海，根据工作需要，六大期间增补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局常委。邓小平时年24岁，八七会议时曾作为中共中央秘书从事会务工作，并和瞿秋白、杨之华夫妇住在一起，根据工作需要，六大期间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秘书长。

国内工作安排完毕，4月30日，瞿秋白化装后由上海起程赴莫斯科。

三 六大代表取道满洲里赴莫斯科

中共六大代表怎样去莫斯科呢？当时，从中国去莫斯科主要有五条线路：一是从上海乘船，经香港、新加坡，穿越苏伊士运河到达欧洲，然后转乘火车前往；二是从上海乘船，经日本长崎抵达海参崴，然后转乘西伯利亚铁路前往；三是穿越蒙古，经库伦（今乌兰巴托）前往；四是经甘肃、新疆前往。但是，这些路线都不如第五条线路，走中东铁路安全。中东铁路的两端满洲里和绥芬河都可以进入苏联，并与苏联全长9288公里的西伯利亚铁路相通。这就是学界所说的“红色之路”。于是，临时中央决定参加六大的代表，除一小部分由上海乘船经海参崴前往外，其余大部分由上海乘船至大连，走中东铁路到哈尔滨，再由哈尔滨经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前往莫斯科。

俄国修建的从满洲里经哈尔滨到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于1903年通车，时称东清铁路。1904年日俄战争后，沙俄把中东铁路之大连经沈阳至长春段转让给日本，称南满铁路。出席六大的代表，大部分到上海集中后于1928年4月下旬到5月上中旬开始启程，大多抵达大连后乘日本管理的南满铁路至哈尔滨，再至满洲里或绥芬河出境。其中大部分代表如张国焘、罗章龙、夏曦及广东代表团等走满洲里线路，瞿秋白、蔡畅、龚饮冰等少部分代表走绥芬河线路^[14]。

为了保证六大代表的安全，使会议准时在莫斯科召开，中共中央在哈尔滨设立了秘密接待站，并派出在临时中央妇委工作的瞿秋白夫人杨之华携其幼女瞿独伊，提前赶赴哈尔滨，

协助完成护送六大代表的工作。在中苏边境那一侧，苏联方面也设立了接待站，负责安排过境六大代表乘坐前往莫斯科的火车。

由于六大代表来自各地，集中上海取道满洲里，所以，上海、大连、哈尔滨、满洲里、绥芬河，是最严重的危险点。

各地代表到白色恐怖城市上海集中，先到接头机关接头。接头办法是：代表到接头处，向接头处人员借火柴吸烟，接头处人员给代表一个火柴盒，代表打开火柴盒，取出火柴盒内藏着的半截火柴递回接头处人员，接头处人员再把半截火柴递回代表，程序无误表明接上头了。接头处人员随即安排代表秘密住下，一般要住一周甚至更长时间，学讲普通话，以免到东北奉系军阀和日本势力范围因语言问题露出破绽而被抓捕^[15]。然后，统一行动，分成20多个小组，分批乘船前往大连或者海参崴。

因为大连被日本占领，所以去大连的代表多数乘日本轮船。当时大连日本当局已经得到情报，说最近有大批共产党要经过大连，车站、港口检查很严^[16]。为了顺利过关，代表们伪装成不同的身份。第五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华全国总工会常委黄平率领三名广东代表从上海乘日本轮船赴大连。同船四人在一个船舱，但假装互不相识。中共广东省委委员、广州起义时任广州苏维埃代理主席的杨殷，伪装成药材商人，船快到大连时，日本警察盘问他，他说是做药材生意的，并打开手提箱，拿出一些药品给他们看，日本警察信以为真，就走开盘问其他人去了^[17]。上海代表王翘让在基督教上海青年会工作的中学同学曹亮，给他和另一代表胡均鹤，开了一封赴基督教哈尔滨青年会接洽印刷圣经一事的介绍信。船到大连，日本警察上船逐个盘问，王翘拿出介绍信，日本警察拆开阅读，王翘和胡均鹤装模作样地用手划十字，日本警察问了几句就去检查其他乘客。对其他乘客，则是寻根问底，搜身，检查行李，连热水瓶都打开看^[18]。瞿秋白夫人杨之华带着六岁的女儿瞿独伊和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以及另外两个代表，一个是湖北代表，一个湖南代表，抵达大连时，也受到日本警察的扣押和追问。日本警察看到杨之华带个小孩，问她是不是贩卖人口的。杨之华反而放下心来，说这是我的女儿，你们不信，可以验血型。这样，日本警察才放了她们（图四）^[19]。

据罗章龙回忆，他的前一组五名代表在大连登岸后，日本警察认为形迹可疑，被带到派出所问话。日本警察劈头问道：“你们是上海来的共产党吗？你们来关东州干什么的？”代表们镇定地按预先准备好的进行回答，并拿出表明正当身份的证件给日本警察看。日本警察询问半个小时，毫无破绽，即停止询问，随即说道：“你们就是共产党，我们大日本政府也不管，只要你们不在南满地带活动。希望你们不要在南满多停留，迅速离开这里。”随后派警察把五位代表送到火车站，监督他们登上火车离开大连^[20]。

在大连，最惊险的是周恩来、邓颖超夫妇。船到大连，二人一上岸就被日本警察带走盘问。在问完姓名、职业、出生年月、到东北何事，以及东北亲属，均被周恩来沉着冷静回答，



图四 一起参加中共六大的瞿秋白妻子杨之华和瞿独伊

毫无破绽后，日本警察打开抽屉看看卡片，直截了当地对周恩来讲：你就是周恩来。周恩来反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根据说我是周恩来呢？我姓王，叫王某某。邓颖超怀疑因为周恩来在黄埔军校做过政治部主任，日本大连警察有他的照片和资料。所以，为了保险，邓颖超到卫生间把到哈尔滨接头用的证件撕碎投入马桶里冲走。日本警察问不出什么，只好放周恩来和邓颖超离开大连。周恩来夫妇经长春，绕道吉林抵达至哈尔滨，因为在大连把接头的证件毁掉了，无法同有关的人接头，只好天天在火车站等候下一批的李立三小组。等到李立三之后，才和李立三小组一起，同哈尔滨的地下党接上了头^[21]。

代表们分批抵达哈尔滨，由中共哈尔滨地下交通站和共产国际秘密接待处安排，分头从哈尔滨到满洲里或绥芬河，偷渡出境。

中共满洲省委5名六大代表，由中共满洲省委工运部长唐韵超领队，携带接头用的装有21根火柴的火柴盒，从沈阳乘火车抵达哈尔滨，找到了接头地点——哈尔滨道里区俄国大街一个马车店。此时，张国焘、罗章龙、夏曦等代表已经抵达这里。张国焘接过唐韵超递过来的火柴盒，数完确定是21根之后，指示唐韵超：因南方代表语言容易暴露，你们满洲省委的代表还有一项任务，就是把你们分到各组，护送南方代表过境。于是，满洲省委的五名六大代表担负起护送其他各地代表离开哈尔滨的任务。第一次护送的是广东代表团。从哈尔滨到满洲里，一路上他们几人尽量不说话，一切由唐韵超出面。上车前，接待站发给每个代表一个过境的号码牌，下车后，根据手中的号码牌，寻找相应的马车。如果一致，就把手中的号码牌交给苏联马车夫，不必说话，点点头上车。此后，唐韵超等又护送云南、贵州和江西的代表过了境。最后护送张国焘、罗章龙等中央代表，并一同过境^[22]。

为了避免敌人的注意和检查，代表们住的地方也不固定，有的在道里，有的在道外；有的住旅馆，有的住同志家。对于男性代表，杨之华往往与其以“夫妻”名义组成“家庭”掩护。杨之华后来回忆：当时，女儿独伊只有6岁，但很懂事，杨之华教她，如果有人问这人是谁，就说是“爸爸”。当完成任务后，小独伊曾奇怪地问妈妈，我怎么这么多爸爸呢？^[23]

从哈尔滨到满洲里，一下火车就有苏联人接应。六大代表或者发给一盒数目固定的火柴，或者拿到一张写有数字的号牌，或者一张标有号码的美钞，然后找接应的马车。苏联车夫驾着马车一路奔驰，就到了苏联境内。从绥芬河出境的代表更是艰苦。湖南代表龚饮冰走的是绥芬河路线，他抵达绥芬河后住在一个家境很贫困的俄国人家中，休息、吃饭后，当晚就在这个俄国人带领下，偷越国境。

“这是一条非常难走的道路，翻山越岭，整整走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上才到了苏联境内的一个火车站，在这里乘车到海参崴，然后转乘去莫斯科的火车，当时火车是烧木样子，车速很慢，由海参崴到莫斯科要走一个多月”（图五）^[24]。

中共中央总书记瞿



图五 绥芬河通往俄罗斯葛罗捷阔沃边境站的别勒注交通线森林小路。图中红色箭头所指树杈上的一根木棍，是交通员做的方向标记

秋白赴苏较为顺利，他4月30日化装从上海登轮起程，船行两天，抵达大连。然后转乘南满铁路火车，至哈尔滨换乘苏联管理的中东铁路，从满洲里秘密出境，5月中旬抵达莫斯科。然后乘坐马车，抵达莫斯科郊区六大会议址^[25]。

四 向忠发在莫斯科的活动

1. 向忠发其人

向忠发1880年生于上海，14岁入汉阳兵工厂学徒，后进入汉冶萍公司属下轮船做事。因其识字较多、活动能力较强和热心助人，被吸收参加汉冶萍工会工作，1922年12月经中共二大代表许白昊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国共合作，他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在武汉担任中共湖北区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汉口市党部工人部部长，和许白昊一起领导武汉地区工人运动。1926年9月，北伐军围攻吴佩孚占据的武汉。为配合北伐军攻城，许白昊、向忠发废寝忘食地领导汉口工人罢工斗争。1926年10月9日，北伐军占领武汉三镇。第二天，武汉成立湖北省总工会，向忠发担任委员长，在国共合作的推动下，会员很快发展到数十万，工人纠察队数千人，成为武汉地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政治力量。同年12月，汪精卫为首的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中共中央政治局选派谭平山担任武汉国民政府农政部部长，选派中华全国总工会委员长苏兆征担任劳工部部长。随后，中共中央从上海，中华全国总工会从广州，陆续迁到武汉。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在武汉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注重工人成份指示下，身在武汉、掌握数千工人纠察队的武汉总工会委员长向忠发成为大会代表，并被选为中央委员。1927年6月中旬，武汉汪精卫集团公开反共，威逼谭平山、苏兆征辞去所任武汉国民政府部长职务，派兵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省总工会。共产国际致电谭平山、苏兆征，令二人公开抗议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共政策并发表声明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但谭平山、苏兆征却向武汉国民政府递交“请假条”以示退出，共产国际对此极为不满。同时，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下令解散向忠发所领导的武汉工人纠察队，以避免武汉工人如上海四一二政变那样遭到大规模屠杀，并将工人纠察队大部分枪械暗中输送到与共产党有密切关系的国民革命军叶挺、贺龙部，以保存革命骨干。向忠发对陈独秀的指令不明所以，对谭平山、苏兆征的行为更是不满，怒气冲冲地前往武昌中共中央所在地，同陈独秀激烈辩论，虽然最终被迫执行陈独秀指令，但给在武汉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罗易等俄国人留下革命立场坚定的深刻印象。

就在中国革命处于万分危机的关头，1927年7月12日，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宣布停止陈独秀总书记职务。7月14日，共产国际致电中共中央，要求坚决与种种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要使在内战时成长的工人和农民党员在党中央内取得决定性的影响。第二天，即7月15日，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集团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向忠发先是藏匿在汉口法租界，随后转移到湖南乡下，幸免于难。

按照7月14日共产国际的指示，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上述明确要求，会议决定将几个工人领袖安排进入中央领导机关。于是，躲在湖南乡下的向忠发，由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直接提名，和同样工人出身的苏兆征、王荷波当选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但知识分子出身主持临时中央政治局工作的瞿秋白，不欣赏和不重视向忠发，一直不给向忠发安排重要性的工作，也不通知他参加政治局会议。

2. 向忠发抵达莫斯科

共产国际不满意八七会议所产生的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指出应大规模地充实工人成分到中共中央来，进一步选拔合格的工人领袖担任中共中央领导。1927年10月，共产国际指示中共中央派出一个工农代表团前往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十周年庆祝活动。既然是工农代表团，工人出身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刚刚来到上海、且没有重要工作的向忠发，自然成为带队前往的最合适的人选。1927年11月初，向忠发一行9人抵达莫斯科。此后，向忠发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工人运动领袖、中国共产党代表身份，出席十月革命红场庆祝活动，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出席东方民族兄弟大会等，很快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共产国际政治处书记布哈林和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共产国际东方部主任米夫建立起工作关系，不久协助布哈林以强硬态度处理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留学生江浙同乡会问题，因成功劝散结队在共产国际办公大楼前示威的莫斯科中山大学军事班中国学生，受到布哈林和米夫的青睐。

就在向忠发抵达莫斯科之后，1927年11月，临时中央政治局在上海召开扩大会议，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再次强调党的领导机关工人成分问题，明确提出党的最重要的组织任务是以工农分子的新干部替换非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干部。1928年1月，在莫斯科的向忠发得到包含上述内容的临时中央政治局上海扩大会议决议。2月，向忠发代表临时中央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九次扩大会议，并被选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主席团委员。会议期间，成立了包括斯大林、布哈林、米夫、向忠发、李震瀛（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研究中国革命问题的“小委员会”。同时，向忠发和李震瀛还同斯大林、布哈林联合起草了批评中共左倾盲动错误的《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草案）》，并获大会通过。这样，向忠发有了更多的机会与斯大林、布哈林、米夫直接接触。

3. 向忠发取得斯大林、布哈林的信任

共产国际要求中共中央吸收工人领袖进入中央领导机关，向忠发是了解的。对于中共中央排挤工人出身的领导人，向忠发是有深刻感受的。于是，他利用自己的独特地位，于1928年1月23日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指出中国“党的领导机关‘工人化’，是目前加强党的主要斗争口号。这个口号是完全正确的”^[26]。1928年2月11日，向忠发又致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会主席团，反映中共党内“最重要的同时也是最迫切的问题”是“党内分裂问题”。1928年2月15日，向忠发又致信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指出中共中央领导成员主要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不但不是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反而将自己政治上不坚定、不彻底、不坚决的态度，不善于组织的习性，以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所特有的习气、成见、幻想，带到中国共产党来，这就是以往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对敌斗争中动摇的本质和根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机会主义错误产生的根源。中共近年来种种失败，多半因为这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人的无能。中共中央前领导人和现领导人中的陈独秀、谭平山、张国焘、彭述之、蔡和森、罗亦农、周恩来、陈乔年等人，就是中国共产党内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或在革命立场上摇摆不定，或因为被解除领导职务、被开除出党对党具有敌视心理。向忠发建议共产国际应该对上述党内分裂现象进行斗争，调整党内关系，既要从思想上加以揭露，又要从组织上加强纪律，“中共能否在不久的将来克服摆在它面前的困难，将取决于这场斗争的成败”。最后，向忠发要求和布哈林见面，谈一谈这些问题，听取布哈林同

志对这些问题的意见^[27]。

布哈林读完向忠发的信后转给斯大林。向忠发的信立即引起斯大林的重视。2月21日，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在中国委员会讨论期间，再次听取了向忠发的有关报告。向忠发在报告中，继续攻击临时中央。他说：党内现在的矛盾斗争，纯粹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特性所致，解决这种问题的最主要方法，就是建立工人阶级的领导并巩固它（图六、图七）。



图六 中共六大前后的
斯大林



图七 中共六大前后的
布哈林

向忠发的上述三封信，表面上是反映中国党的现实情况，实际上大多内容是道听途说的主观推测，带有向斯大林、共产国际告恶状的性质。对于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对他的冷遇，他内心是很不满意的，但他很聪明地并没有攻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李维汉，他知道自己的威望比这两人差之甚远。这个时候，他还没有取代瞿秋白做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打算，他只是想排挤一下中共中央领导机关内部的部分知识分子干部，让自己在政治局里的地位名副其实。但是，此时的斯大林、布哈林已经严重地不信任中国党内的知识分子，试图寻找工人领袖来领导中国党。所以，尽管向忠发的信在文字上或逻辑结构上都不怎么样，在面谈时的表现也不佳，但还是被斯大林和布哈林确定为中国党工人领袖。

在国内，对向忠发的不信任仍然在继续。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之后，政治局常委决定向共产国际派驻全权代表，以便及时反映中共遇到的各种重大问题。本来，政治局委员向忠发已经在莫斯科，并且发挥着临时中央代表的作用，但政治局不相信几个月来始终没有参加过政治局会议的向忠发能够准确、全面地反映中国革命的实际情况。为此，他们决定派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苏兆征来担任这一职务。临时中央政治局为此致函共产国际：中共中央决定以苏兆征、向忠发和李震瀛三人组成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以苏兆征、向忠发为全权代表，苏兆征为书记，李震瀛为秘书。1928年3月7日，苏兆征抵达莫斯科。不让已经在莫斯科的向忠发担任中共中央驻共产国际全权代表，却把苏兆征派来位居自己之上，向忠发当然很不满意。但令向忠发欣慰的是，由于斯大林、布哈林已经认可向忠发，又因为向忠发与共产国际上上下下已经搞熟，共产国际仍旧喜欢与他而不是与苏兆征打交道。结果，苏兆征身为代表团书记，并在各种正式文书中挂名于前，但做实际工作的仍旧是向忠发。

五 中共六大的召开

1. 出席中共六大的代表组成

1928年5月底至6月上旬，中共六大代表陆续抵达莫斯科。中共六大会址在莫斯科近郊纳罗福明斯克区五一村。此处原为俄罗斯沙皇时代大贵族穆辛·普希金的庄园，旧名尼科利斯基村，十月革命后更名为五一村。五一村位于莫斯科南，距离莫斯科37公里。

中共六大代表分期分批抵达莫斯科后，为了保密，“当载有代表的列车驶进莫斯科火车站时，代表们的包间都放下窗帘，待所有的旅客走光后，汽车开进站台，把代表们直接从火车上拉进会场，一路上车子也挂上窗帘。代表们一到大会会址，立即换穿列宁服或西服，尽

量不使他们显眼……六大代表在会议期间从不在公共场合露面——他们甚至不去游览莫斯科市容。”^[28] 会议期间严格保密，不对外发表任何有关中共六大的新闻。代表们也同当地居民接触。当地居民只知道有中国人在庄园里开会，但不知道开什么会（图八）。

实际参会的六大代表有多少？周恩来是中共六大的秘书长，他在《关于中共六大的研究》一文中，说中共六大共有 75 位代表，但根据中共六大原始档案六大代表报道编号，参加中共六大的代表一共 142 人，其中代表 93 人，指定及旁听代表 49 人。

93 名六大代表，其中正式代表 87 人，非正式代表 6 人，正式代表中有选举权的代表 84 人。这是怎么回事呢？ 6 名非正式代表包括共青团中央委员代表 5 人和特约代表张国焘 1 人，

没有选举权的 9 名代表包括共青团中央委员代表 5 人和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杨之华 4 人。邓中夏、瞿秋白、周恩来、杨之华 4 人没有选举权，但有被选举权，为什么如此，需要进一步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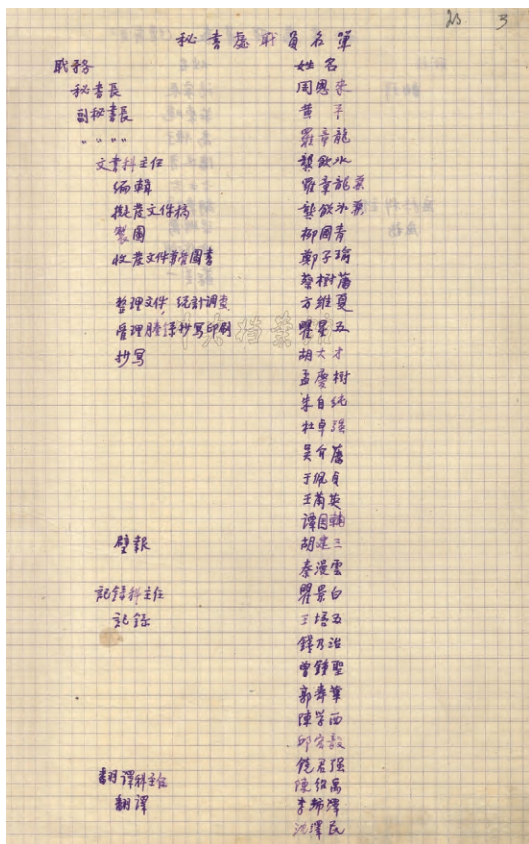
93 名六大代表中，著名的共产党人有瞿秋白、周恩来、李立三、向忠发、苏兆征、蔡和森、邓中夏、关向应、王若飞、张国焘、项英、罗章龙、蔡畅、阮啸仙、杨之华等（图九）。

那么，49 名指定及旁听代表又是怎么回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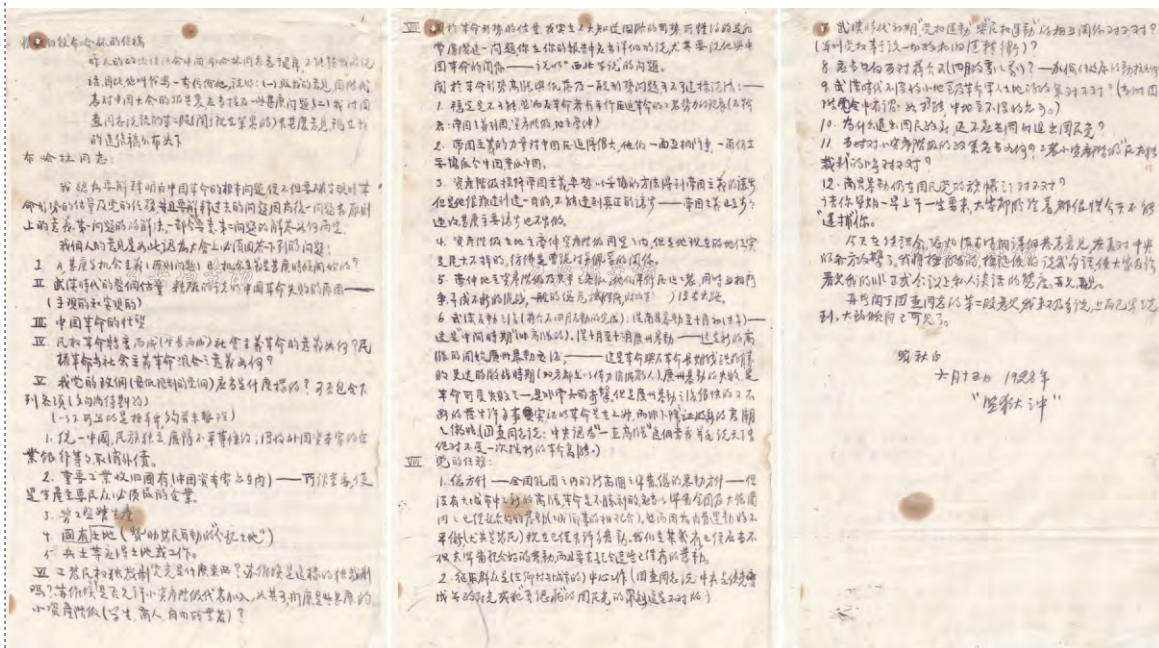
指定及旁听代表由三部分组成：一部分是非六大代表的著名共产党人邓颖超、刘伯承、刘伯坚、何叔衡、徐特立等；一部分是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抽调来的从事会务工作的 15 名中国留学生，如精通俄语并任翻译科主任的陈绍禹（王明）、翻译沈泽民（茅盾的弟弟）等，从事记录工作的记录科主任瞿景白（瞿秋白之弟）、记录员王培五等，从事文件登记誊抄工作的文书科主任龚饮冰、抄写员孟庆树（女，后与王明结婚）、秦曼云（女，后与关向应结婚）等。还有一部分是跟随六大代表来到会场的一些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如罗亦农的夫人李文宜等。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26 岁的罗亦农 1928 年 4 月 21 日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后，他的 25 岁的新婚妻子、时任中共湖北省妇委会委员的李文宜痛不欲生，瞿秋白夫人杨之华遂动员她跟随自



图八 中共六大会议旧址



图九 中共六大秘书处职员名单第一页（共两页）



图一〇 1928年6月15日瞿秋白致布哈林信

已前往莫斯科，李不是正式代表，因而被指定为旁听代表。当时为中山大学女学生同时也是陈昌浩夫人的杜作祥和王若飞的夫人李培芝，虽然没有做会务工作，但也随同陈昌浩和王若飞参加大会，并被指定为旁听代表（图一〇）。

除了49名指定和旁听代表，还有11名由中山大学学生组成的纯大会工作人员，其中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王稼祥、乌兰夫。值得注意的是，当时也在中山大学学习的张闻天、杨尚昆、博古（秦邦宪）、张琴秋、凯丰（何克全），和陈绍禹（王明）、孟庆树、沈泽民、陈昌浩、杜作祥等都是王明为首的莫斯科中山大学“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成员，没有被选去参加会务工作，当然也没有成为旁听代表。

2. 共产国际对六大的指导

进入1928年5月中旬，为了准备中共六大的决议草案，共产国际派出东方部和中山大学的部分教授，分11个小组，协助中共临时中央起草有关决议，其中沃林、约尔克、塔尔汉诺夫、弗列依耶协助瞿秋白、李立三、向忠发起草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决议，加伦、马迈耶夫协助周恩来、杨殷起草军事工作决议，米夫主持起草组织问题决议案。

6月上旬，包括瞿秋白、周恩来、邓中夏、张国焘、苏兆征在内的中共六大代表大多来到会址。6月9日，斯大林召集临时中央主要领导人就中国革命问题进行谈话，出席者有瞿秋白、苏兆征、周恩来、向忠发，还有不是政治局委员的李立三，米夫在座陪同。

会上，瞿秋白首先代表临时中央就中国革命形势等问题向斯大林做了汇报，仍然认为中国革命形势处于高涨阶段。但是，经过大革命失败近一年残酷的血的教训，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已经改变了对中国革命形势的认识。听完瞿秋白汇报，斯大林指出：秋白报告中，许多地方是对的，可是也有错误。目前，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经处于高潮，中国革命胜利的条件，比1905年以后的俄国更为复杂。革命高潮是革命的进攻，反革命的退让。目前的中国，

日本掌握北方，英日美掌握着长江，法英控制着南方，而我们的范围很小。大城市都在反革命手里，我们的敌人帝国主义在华并未减弱，假如我们掌握住主要城市，才能说是革命高涨。所以，现在我不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到来了。现在的形势不是高潮，而是两个高潮之间的低潮。为了更形象些，斯大林还画图加以说明。李立三当面辩驳，仍然坚持革命形势还是高潮，理由是各地还存在工人、农民的斗争。斯大林回答说：“在低潮时也会有几朵浪花，你说的那些只是浪花。”斯大林同时指出现在中共的工作重点，是加强党的坚固性，增强党员的政治觉悟，做好群众工作，做好农民工作，开展土地革命，培养军事干部，创建人数众多的红军，等等^[29]。李立三后来回忆说：斯大林像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师，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我们解释了极为复杂的政治问题，从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一直谈到斗争方式和工作方法。斯大林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谈话对中共六大起了指导作用，不仅为党的总路线，也为党的方针政策等各个问题都指明了方向，成为六大各项决议的基础^[30]。

6月14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召开会议，决定成立由布哈林、米夫、英国共产党总书记波立特、法国共产党总书记恩利·白培、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陶里亚蒂、瑞士共产党总书记安贝尔·德罗、芬兰共产党总书记库西宁等组成的中共六大指导委员会^[31]。当日和第二日，斯大林又委托布哈林主持，米夫参加，召开了21人参加的中共六大代表座谈会，主要代表有瞿秋白、周恩来、王若飞、蔡和森、项英、苏兆征、李立三、张国焘、黄平、夏曦等，就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形势和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今后的方针任务等问题，

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这次会议进一步交流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一定程度上澄清了党内在中国革命性质和革命形势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为六大顺利召开打下了良好基础（图一一）。

这样，共产国际、斯大林帮助中国共产党为中共六大制定了基本正确的政治路线。

3. 大会主席团构成

6月17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省代表团书记联席会议，初步通过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副秘书长以及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委员名单。当晚，瞿秋白主持召开大会预备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大会主席团、秘书长、副秘书长名单、大会议程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的组成等。大会主席团由22人组成，斯大林、布哈林为主席团成员，其他20人中著名代表有瞿秋白、周恩来、苏

姓名	出身	资格
曾文甫	农民	江西代表
项英	工人	江苏代表
徐锡庚	工人	江苏代表
余萍怀	工人	湖北代表
陶相照	工人 (鄂西矿工)	中央代表
向忠发	工人	湖北代表 中央委员
王凤翔	农民	江西代表 农民
李立三	学生 (西俄工)	中央委员 广东代表
王灼	工人	广东代表
蔡和森	知识分子	湖南代表 中央委员
杨殷	工人	广东代表
邹中	工人	中央委员
胡福田	农民	广东代表
周秀珠	女工	广东代表 女
毛简青	知识分子	湖南代表
王葆文	工人	湖南代表
苏兆征	工人	中央委员 广东代表
周恩来	知识分子	中央委员
瞿秋白	知识分子	中央委员
斯大林	知识分子	国际代表
布哈林	知识分子	国际代表

图一一 大会主席团名单

兆征、邓中夏、蔡和森、李立三、向忠发、关向应、项英等。主席团成员中，工人出身的10人，农民出身的3人，知识分子6人（包括斯大林、布哈林），学生1人。按照斯大林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共领导机关工农化”的要求，工农出身的代表占主席团成员的三分之二。大会秘书长为周恩来，副秘书长黄平、罗章龙（图一二、一三）。

4. 中共六大的召开

1928年6月18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主席台是一张蒙着白布的长桌子，台下的代表一律坐在长凳上。在布哈林和米夫建议下，开幕大会由向忠发主持。

向忠发首先宣布大会开幕，全体代表热烈鼓掌。接着唱国际歌和通过大会秘书处、审查委员会、大会主席团名单。然后是追悼牺牲的革命烈士，先由向忠发致悼词，接着全体代表起立，向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来死难的烈士默哀三分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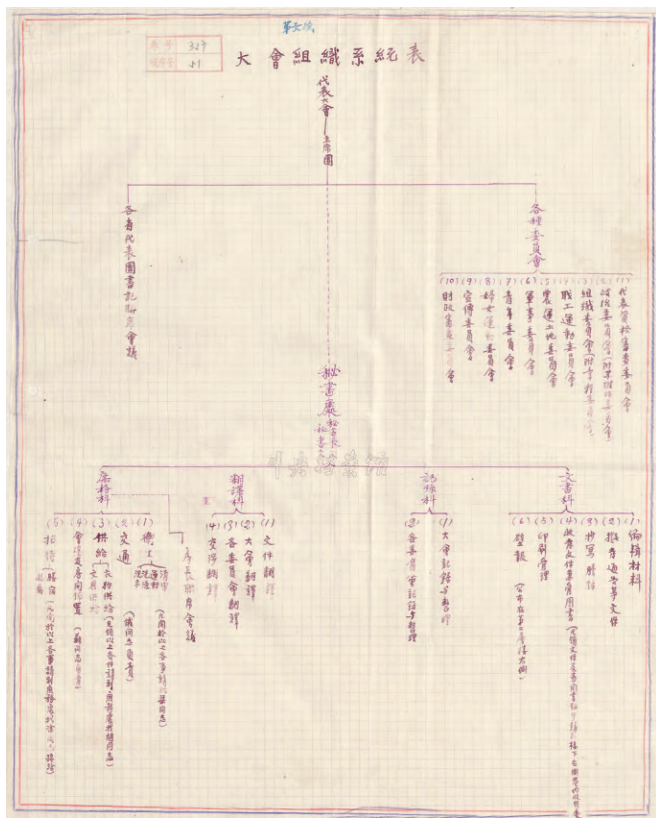
中共早期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如张太雷、向警予、罗亦农、赵世炎、陈延年、陈乔年、熊雄、陈铁军、周文雍等，都是在六大前为了崇高的共产主义理想而英勇献身的。想到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的几十万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想到一幕幕惨不忍睹的悲剧，与会代表悲痛难忍，哀悼时全场哭声一片。

哀悼完毕，瞿秋白以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名义致开幕词。他说：在我们党的五大和六大之间，反革命势力一致行动，压迫屠杀我们，甚至联合力量来消灭我们。我们虽然有无数同志领导工农战士同敌人展开英勇斗争，但由于党中央陷入机会主义，因而使革命遭受失败，许多同志英勇牺牲。八七会议纠正了机会主义错误，但党内又产生了盲动主义。这次大会要充分发扬民主，纠正一切错误倾向，使党走到正确路线上来，完成中国革命的伟大任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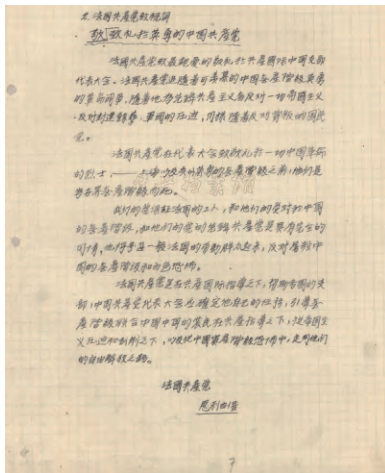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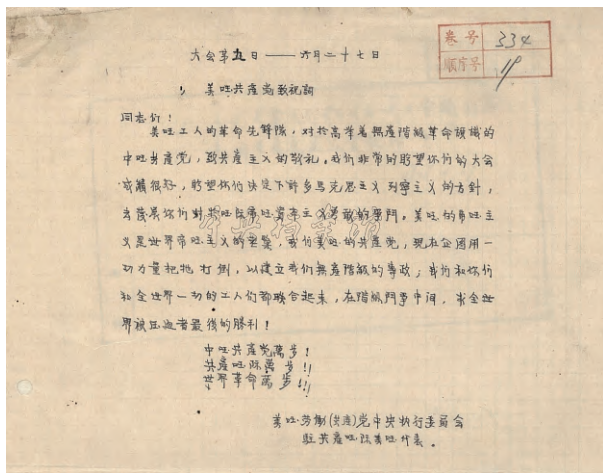
接着，共产国际代表、意大利共产党代表、联共（布）代表、美国共产党代表、法国共产党代表、少共国际代表、中国少共代表、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向大会召开致祝词（图一四）。

最后，全体代表高呼“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唱少年先锋队队歌，而后宣布开幕大会结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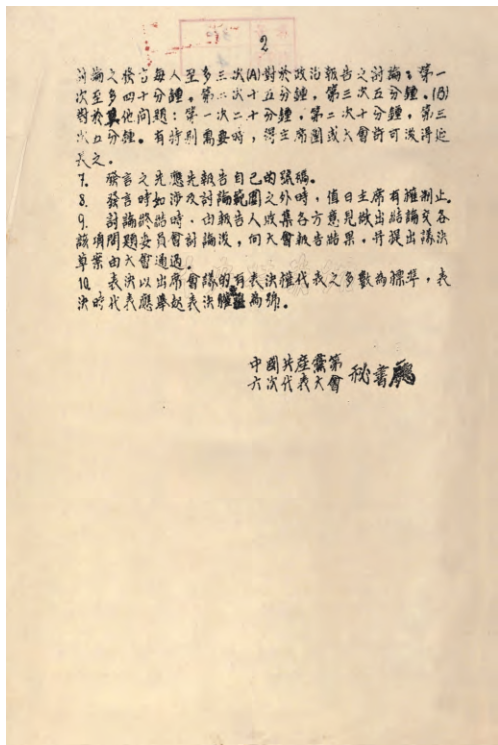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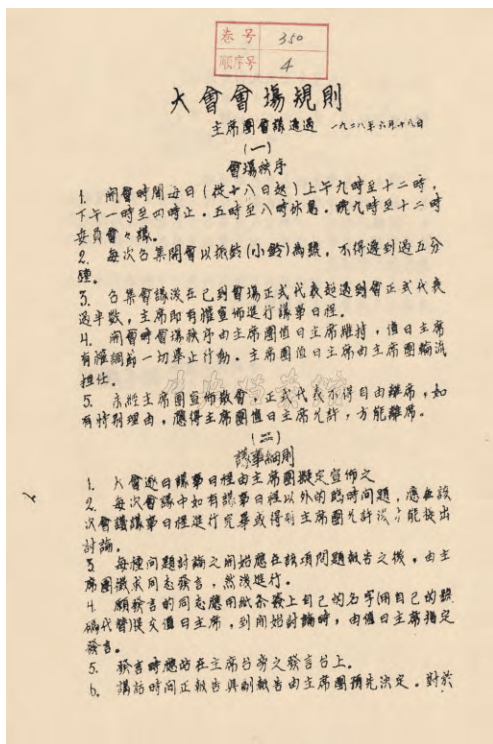
6月19日，共产国际书记布哈林做了长达9个小时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任务》



图一二 中共六大组织系统表



图一三 美国共产党贺信、法国共产党祝词



图一四 1928年6月18日大会主席团通过的大会会场规则

报告,对中国革命的性质、任务和革命形势等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布哈林明确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完成土地革命。他指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不是要求工人阶级直接夺取政权,不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和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前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的,是无产阶级的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形势,布哈林指出,现在还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的形势,现在的任务不是夺取政权,而是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在谈到中共的路线和政策、策略时,布哈林把反对盲动主义列在首位。他说,没有相当的准

备，没有一定的成熟的形式，没有广大群众高潮的条件而开始暴动，这便是玩弄暴动，这种暴动“可以使党走上将来失败的痛苦道路”。

6月20日，瞿秋白代表第五届中央委员会做了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报告。报告也长达9小时，共讲了中国革命、过去党的教训、现阶段盲动主义的危险、革命形势、党的任务等五个问题。在报告中，瞿秋白阐述了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论述了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革命领导权的斗争，批评了大革命时期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对于“左”倾盲动主义做了自我批评，也希望代表们批评自己。关于大革命失败原因，瞿秋白反对互相指责，反对一味要求追究个人责任，主张不但要勇于批评别人，也要严于批评自己。我们也可以批评共产国际，批评对中国革命指导的不切实。此前，张国焘和瞿秋白就大革命失败责任问题争论激烈，张国焘不断指责瞿秋白，热衷于追究个人责任。在政治报告上，瞿秋白认为追究责任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确定以后的正确路线。他最后说：关于过去的事，或者国焘是对的，秋白是对的，独秀是对的，这些问题讨论起来是有意义的，但不能同我们目前的任务相比。张国焘不满地打断说：你一个人讲了9个钟头，七七八八讲了一大批。瞿秋白说：我们应指出不对的，指出少数主义、改良主义的倾向，大家来纠正，至于辨别个人是非，并不是不需要，希望组织委员会来解决，将来向大会报告即可。这是议事日程上已决定的问题。现在我的报告完了（全场鼓掌不止）。瞿秋白报告中一个主要的错误，是仍然把当前中国革命的形势估计得过高，认为革命显然是高涨的，因此党的总策略仍然是武装暴动夺取政权。

从6月21日至28日，代表们用了7天时间来讨论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政治报告。6月29日，布哈林和瞿秋白分别做了政治报告的总结报告，结合代表的讨论，确定了较为正确的党的方针政策。

从6月30日到7月7日，周恩来作组织报告和军事报告，李立三作农民问题报告，向忠发作职工运动报告，大会讨论通过了关于政治、军事、组织、苏维埃政权、农民、土地、职工、宣传、民族、妇女、青年团等问题的决议，以及经过修改的《中国共产党党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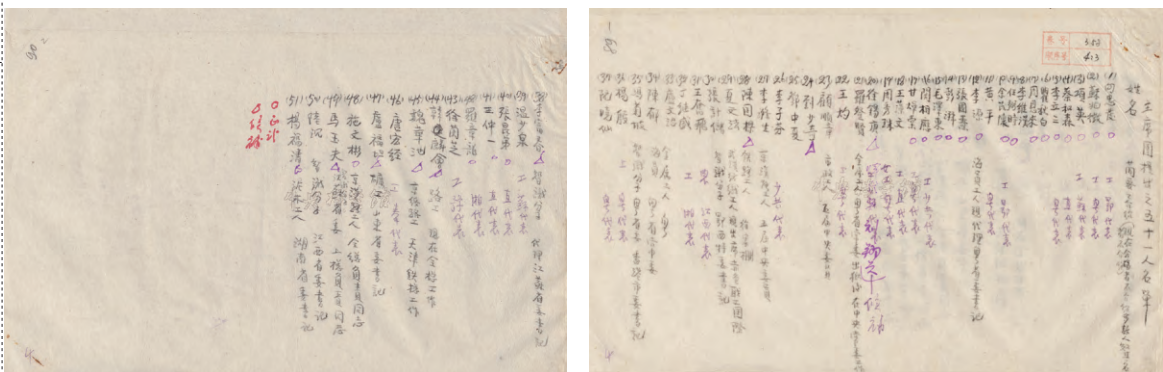
在讨论布哈林和瞿秋白的政治报告，特别是在讨论瞿秋白政治报告，以及讨论和通过其他报告过程中，充分发扬了党内民主，真正做到了知无不言，言者无罪，闻者足戒。中国共产党的内部分歧，在这7天的讨论中，也反映得淋漓尽致。

5. 六大代表内部的分歧

周恩来在《对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一文中指出：“在六大会议上是有‘山头’倾向的，不能完全平心静气地讨论问题，特别是与自己有关的问题，把反对机会主义与盲动主义看成人身攻击。那时机会主义的代表是张国焘，盲动主义的代表是瞿秋白，两人争论不休。”^[32]

张国焘认为大会代表有四派主张：一是瞿秋白和他的少数追随者，坚持八七会议的路线是正确的；二是王若飞、汪则楷这两位与陈独秀关系密切的人物，严格批评瞿秋白所作所为都是错误的；三是在这两种极端主张之中，周恩来、李立三、邓中夏等，主张维持瞿秋白中央的领导，但须纠正错误；四是张国焘自己和蔡和森、项英、罗章龙、王仲一等，主张瞿秋白应彻底改正错误，才能继续在中央工作^[33]。

李立三也认为六大代表有四个派别。他说：“大会代表中就有各派代表：（1）极右派，即陈独秀取消主义派；（2）张国焘、罗章龙为首的右派，他们的政治纲领实际上与极右分子相同，都主张开国民大会；（3）项英为首的江苏派，这一派的立场比前两个更正确一些，他



图一五 大会主席团提出的中共六届中央委员51人候选人名单，用圆标示的为正式委员，用三角标示的为候补委员。

们既反对中央搞暴动主义，也反对陈独秀极右分子，但对右派分子采取妥协立场；(4)‘左’倾派别，包括以瞿秋白同志为首的中央，得到广东代表团和共青团代表团的支持。前三个派别联合反对中央，中央又反过来反对他们。我是最后一批来开会的代表之一。此时，我同意瞿秋白同志的错误观点，认为革命形势仍在不断高涨。”^[34]

在这些不同的主张和立场中，张国焘和瞿秋白的争辩最为激烈。米夫试图以共产国际的名义，调解张国焘和瞿秋白的分歧。他开门见山地向张国焘说：共产国际希望你和瞿秋白能化除成见，互相合作。张国焘表示：只要瞿秋白能纠正错误，合作当无问题。米夫进而探询：是否这种合作带有勉强性？张国焘指着案几上的一个瓷茶杯说：就像这个茶杯，被打成几片，虽然可以补起来，终究不如没有补的那么自然，也希望以后再不会有人将它打碎。米夫接着说：“共产党的组织究竟不好比作一个茶杯，因为它是有机的东西，共产国际自信有力量领导中国同志，改正错误，并使他们团结合作，只要你答应，我就可以向共产国际报告我们中间已获得谅解。”倔强的张国焘听出米夫代表共产国际的强制态度，当即表示尊重共产国际的裁处（图一五）^[35]。

从中共六大代表的争论来看，张国焘、瞿秋白之间矛盾最大，王若飞为陈独秀辩护最力。此三人各有部分代表支持，在讨论中争辩不休，甚至彼此人身攻击，不但给斯大林、布哈林、米夫留下极不好印象，也使得驻会做会务工作的陈绍禹（王明）、沈泽民等人，心生对张国焘、瞿秋白等中共高级领导人轻视之心，认为其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很低。

六 中共六大的选举

1. 王若飞等力争失败，陈独秀落选中央委员

中共六大代表中，支持陈独秀的有正式代表王若飞、特约代表彭述之、指定与旁听代表汪泽楷和刘伯坚，还有中共中央党报委员会委员任旭和中共湖南省委常委何资深，云南代表王懋廷，江苏代表蔡振德、马玉夫等。在这些代表中，王若飞地位最高。他在陈独秀总书记任上做中共中央秘书长，兼任中共江苏省委常委、农民部长和宣传部长，很积极地配合陈独秀工作，也被认为是犯了右倾错误。共产国际和临时中央在批评陈独秀右倾时，也多次严厉批评王若飞。此前，许多受到批评的中共高级领导人都采取送到莫斯科学习方式，变相解除领导职务。因此，当临时中央决定王若飞作为正式代表赴苏参加中共六大时，王若飞

提出参加六大可以，但会后必须回国工作，以示赴苏并非是对自己的处罚。瞿秋白、周恩来批评王若飞，指出党员应无条件服从组织，不应提出前提条件。王若飞接受批评，同意无条件赴苏参加六大。

在六大会上，在讨论瞿秋白做的政治报告时，王若飞作了一次发言、两次声明，承认陈独秀犯了右倾错误，检讨了自己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盲目信仰执行陈独秀指示的行为，并重申自己对陈独秀右倾错误应该负很大一部分责任。但王若飞同时指出：党的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批判陈独秀错误，不允许陈独秀参加是不对的，陈独秀对此有意见不参加六大是“有部分理由”的。他还提议继续推举陈独秀为中共中央委员候选人。王若飞的发言引起会议绝大多数代表的不满，瞿秋白、张国焘等认为王若飞有意袒护陈独秀。有人讥笑王若飞是陈独秀的“尾巴”。一同参会的妻子李培之也怀疑王若飞站错了立场。但是，主持会议的米夫说：虽然我们反对王若飞，但是王若飞的发言，比起瞿秋白、张国焘来，更接近国际路线。18年后，1945年6月中共七大结束时，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袖的毛泽东郑重地对王若飞说：你在六大时对陈独秀采取的态度，是正确的^[36]。

大会在选举阶段，提名陈独秀为中共六届中央委员候选人，除了王若飞，还有指定及旁听代表汪泽楷和刘伯坚。汪是湖南醴陵人，1927年4月出席党的五大，8月任中共江西省委书记。刘伯坚是1922年的老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任中共湖北省委组织部长、江苏省委常委、宣传部长等职。二人都曾在陈独秀直接领导下工作。汪、刘的提名，同样遭到其他代表的反对。临时中央常委蔡和森指出他们二人推荐陈独秀“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政治作用”，意思是汪、刘二人袒护陈独秀，企图维护陈独秀的政治地位。

在众人的反对下，陈独秀当然没有入选六届中央委员。

选举结束后，汪泽楷不服气，要求发言。主持人征求大会代表意见，代表们知道汪是陈独秀的拥护者，同意给汪五分钟的时间，让他讲一讲。

汪泽楷情绪性地指出：

和森同志说我们的名单之中有独秀名字，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有政治作用；我却以为他这些话是很奇怪的，有政治作用的。我们提出的中央委员名单，不分什么新机会主义、旧机会主义，而是认为只要能工作，是一个人才，有政治经验，有工作的历史，有能力，一律提出。我们为什么又提独秀的名字呢？因为他有政治经验，对于党有很大的贡献，没有卑鄙的污浊的行为，对于工作很努力；虽然他以前是机会主义的，但他现在是接受了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的决议案，既有政治经验，又有工作能力，所以我们提他。我们不可以因为他有错误，就说他一钱不值。要纠正他的错误，就要让他在实际工作中接受党的政策，接受党的批评，以新的贡献，补偿过去的过失。我们是为了党，并不是拥护谁，也不是代表谁的意见，也不是为了钱。是为了党，并没有政治性质，也没有政治作用。

刘伯坚也发言表态说：

选举之后，没有别的话可说，希望被选举的中央，不用揣测别的，在新的精神之下工作好了。

汪、刘二人发言刚一结束，就受到大家的批评。

苏兆征说：

汪泽楷说自己是为了党的利益，而实际不是。陈独秀破坏了党的民主集中制，国

际屡次让他来，六次大会也让他来，他不来，破坏了党的纪律。独秀有政治经验是不错的，但他并没有接受国际九次扩大会的决议，没有接受对他错误的批评。你为他说话，你与独秀一样。汪泽楷马上回敬了一句：“太恭维了！”

瞿秋白接着发言说：

独秀过去的工作是有历史意义的，但他也犯了错误，共产国际和党内同志都希望他改正过来。汪泽楷的话没有意义，不必讨论。

向忠发发言说：

汪泽楷说过去党有政治上组织上的错误，陈独秀工作是有历史的，主要的责任应加之新中央，这是对的。可是汪泽楷出席大会的态度与精神，完全不是好的。他只是骂人。国际工作的，中央工作的，所有同志都是混蛋，这是不对的，不是布尔什维克的态度！说独秀同志过去工作是有成绩，谁也没有否认。是否对于他失望了呢？没有！国际及中国党都要他来，如果他是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者，应该来！在会场上捣乱，也是大混蛋。

蔡和森为自己解释说：

汪以前也说过，机会主义错误大家都要负责任，我们谁也没有否认，我们同样也犯了错误，但独秀“是有一致的路线的”，对于陈独秀的批评，并不是阴谋、捣乱、政客手段，不能乱骂。汪同志注意，党内可以有批评，可是不能乱批评。

张国焘一直认为陈独秀是冤枉的，他赶紧发言说：

独秀有功绩，错误大家都要负责，不在谁多谁少，仍旧可以为党工作。汪的话不是爱陈，内容可以不究，态度实在不对，大会应给以警告。

团中央代表李子芬听出张国焘发言中为陈独秀的辩解，指出：

汪的说法是反对党的利益，代表了落后的思想，代表个人，代表小资产阶级的个人报复，国焘的说法是不了解汪这些话的严重性。大会快要闭幕，还闹出如此扫兴的事情来，可见机会主义的影响，我们应该继续与机会主义奋斗。汪泽楷到大会上捣乱，实在不对，应该用他自己的话骂他自己。

王若飞看不下去了，发言为自己和汪泽楷辩解：

汪的态度是有缺点的，但大家对汪的批评太过，不必太动感情。说他提议独秀很奇怪，有政治作用，是误会他了。大家都认为陈独秀的工作是有成绩的，过去的错误也很大，但不能由他一人负责。和森、秋白也说过，谁改正，即可工作。陈独秀不来，国际和中央都有误会。汪提陈独秀为中央委员会候选人也是可以的。叫陈独秀做另外的工作也可以，不一定工作就做中央委员。

王若飞越讲越多，明显是为陈独秀和汪泽楷辩护，台下有人提议要他停止说话。会议主持人宣布停止王若飞发言，并问台下：有人提议给汪泽楷警告，有附议没有？台下有人表示赞同。于是大会表决，大多数通过，“决议，大会给汪以严重警告”。见此情况，刘伯坚主动说：给我以警告。大会没有接受他的意见^[37]。

2. 毛泽东缺席当选中央委员

毛泽东缺席中共六大，同时刚刚被临时中央给以处分，之所以当选中共六大中央委员，

一是对中国革命做出了显著的成绩，二是得益于留守中央李维汉的及时荐举和共产国际米夫的亲自提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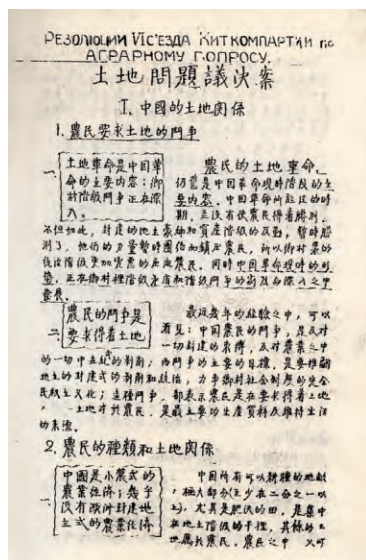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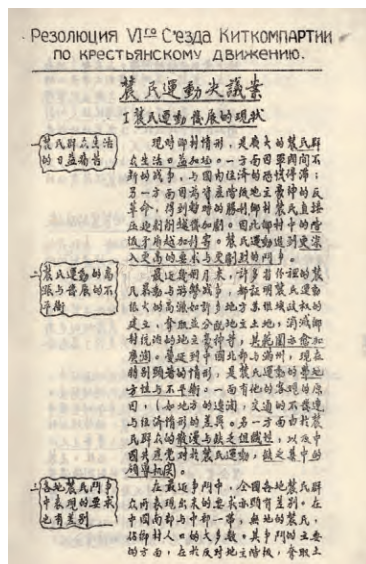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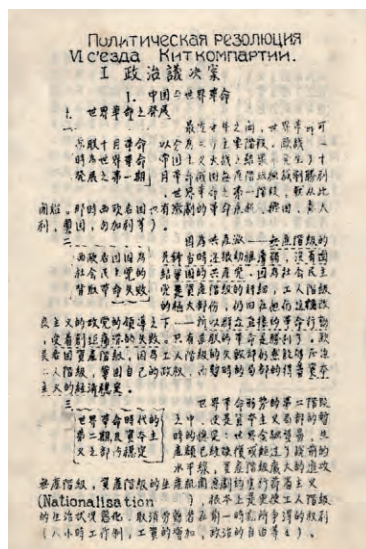
毛泽东率 1000 余人的秋收起义部队，经过三湾改编，之后进军井冈山，创建了井冈山农村革命根据地，并于 1928 年 2 月粉碎了敌人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第一次“进剿”。在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中，毛泽东创造性地制定了工农革命军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形成了“敌来我去、敌驻我扰、敌退我追”游击战争经验。各地农军纷纷向井冈山靠拢，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队伍日益壮大。

1928 年 4 月 28 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部队和湘南起义农民军，贺龙率领南昌起义部分部队，与毛泽东领导的工农革命军，在井冈山胜利会师。随即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统辖 3 个师 9 个团，计 1 万余人。当此之时，毛泽东、谭震林、滕代远、何长工、陈正人、江华、张际春、贺子珍、曾志等担任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方重要领导职务。后来的五位荣膺中国人民解放军元帅的朱德、彭德怀、林彪、陈毅、罗荣桓，三位荣膺大将的粟裕、谭政、黄克诚，14 位荣膺上将的邓华、杨得志、肖克、宋任穷、宋时轮、张宗逊、陈士榘、赖传珠等，20 位荣膺中将的张国华、唐天际、谭冠三等，12 位荣膺少将的龙潜、彭龙飞等，担任第四军军内领导职务。红军兵强将猛，一举粉碎敌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进剿”。

1928 年 5 月 2 日，在永新县城，毛泽东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军委书记名义，致信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报告朱德、毛泽东两支部队井冈山会师后建立工农红军第四军的组织状况，以及打破敌人第二次“进剿”取得胜利的情形，报告革命军队和地方政权对内建立党组织，对外发动各地工农暴动，建立工农政权，分配土地状况。因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地跨湘鄂两省，毛泽东在报告中建议成立湘赣边界特委，创建以井冈山为中心的罗霄山脉政权，用强有力的军事力量去造就湘赣两省的革命根据地^[38]（图一六）。

毛泽东的这个报告发出不久，5 月中旬，毛泽东和朱德又指挥粉碎了敌人第三次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进剿”。

约在 5 月中旬，上海留守中央李维汉收到了毛泽



图一六 1928年7月9日通过的政治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土地问题决议案

东5月2日的报告。当时全国革命处于低潮，李维汉看到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起了稳固的革命根据地，且红军有一万之众，又惊又喜，于5月25日致信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另附留守中央对毛泽东报告的指示信。

在信中，李维汉用了较大篇幅介绍土地革命的情况：“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朱（德）和毛（泽东）到了赣西南，并且据报告说，他们占领了永新和宁冈，之后向赣南发展直至吉安。朱培德部的第九师被彻底击溃，一部分已转到朱、毛方面。还在朱、毛入赣之前，赣南的寻乌、雩都、南康、信丰等县就爆发了自发的农民暴动。虽然万安的农民遭到了非常惨重的失败，但是在朱毛入赣以后，这里的农民又揭竿而起。现在我们有希望顺利占领赣南地区……”^[39] 这里，李维汉用“湘赣的形势相当好”来评价毛泽东领导的井冈山根据地的斗争，其欣喜赞誉之情跃然纸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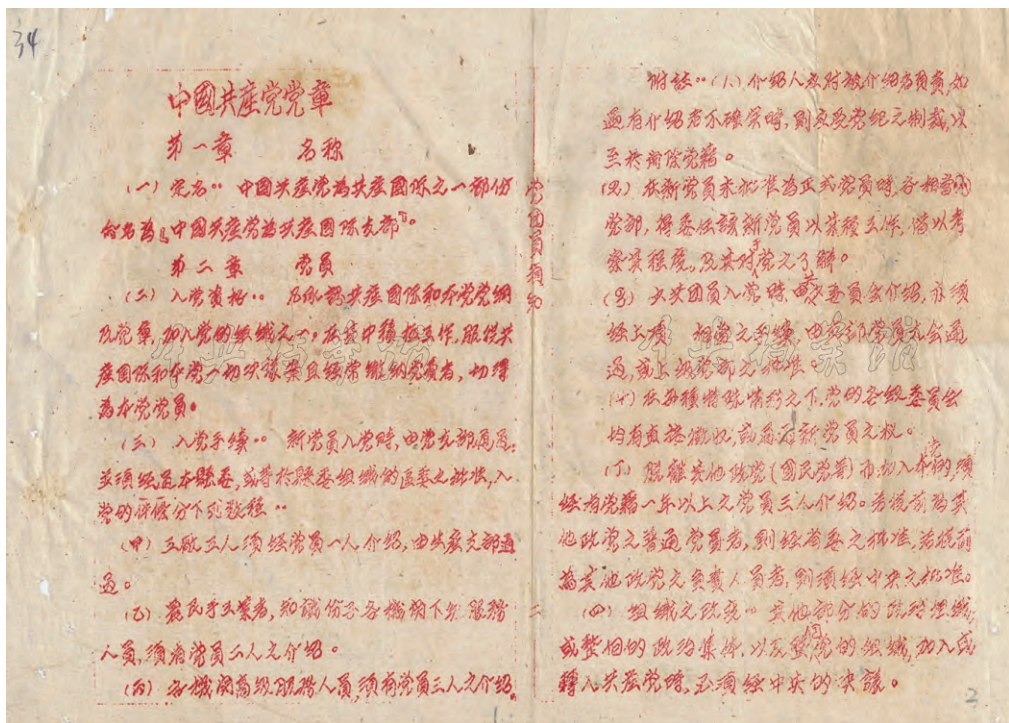
李维汉所拟留守中央对毛泽东的指示信，指出你们的任务就是在湘赣或赣粤边界，以你们的军事实力发动广大的工农群众，实行土地革命，造成割据的局面向四周发展而推进湘鄂赣粤四省暴动局面的发展，中央认为有前敌委员会组织之必要，以毛泽东为书记^[40]。

6月下旬，李维汉的信转到正在帮助中共筹备中共六大的米夫手中。米夫一直主张中共应建立一块稳定的根据地，然后向四周发展。1928年3月1日，米夫曾在《真理报》刊文发表对中国革命的看法，认为中国的农民运动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为革命的新高潮创造了先决条件”，但没有稳定的根据地的分散的游击斗争“注定要失败的”。4月6日，米夫致信布哈林，主张中共应占领和巩固一个地区作为“运动根据地”，再向周边扩大，鉴于湖南农民运动高涨，可以“首先向湖南边境扩大”，并提出在游击战争中扩大红军、开展农民运动、实施土地纲领和建立苏维埃等。毛泽东创建的湘鄂赣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与米夫的思想不谋而合，或者说是具体革命斗争中实践了米夫的这方面主张。

很显然，米夫非常赞同朱毛的做法。米夫阅后，于6月26日将李维汉的上述信件制作副本，转送包括斯大林、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在内的7名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最高领导人。这样，毛泽东及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治影响一下子扩大到共产国际和联共（布）最高层。

作为筹备和指导中共六大的负责人，而且恰好在中共六大即将选举中央委员之时，米夫将李维汉来信制作副本转送上述诸人，无疑是想说明，来自井冈山朱、毛革命斗争第一线的胜利成果，证明了他发动农民开展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主张是无比正确的。与此同时，毛泽东无疑给米夫留下了正确路线的印象。

从中共六大代表，特别是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李立三等人，在六大讨论中对建立农村割据政权的态度来看，李维汉的信件在一定程度上坚定了他们领导农民革命、实行农村割据的信心和决心。讨论中，周恩来明确指出广州暴动之后“农村的土地革命更加深入”，已形成“农民发展与城市沉闷”的反差景象。瞿秋白也明确指出：在一定条件下农村割据是有发展前途的，要求全党主动地领导农民运动。最后，六大《政治决议案》对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作出高度评价：秋收暴动在许多地方扩大了党在农民群众之中的影响，将土地革命的口号渗入了广泛的农民群众的意识之中，并郑重提出党要“发展苏维埃的根据地”，夺取并巩固新的区域，最大限度地发展红军，彻底实行土地纲领和建立苏维埃政权等。六大《政治决议案》为中共开展土地革命指明了方向，其中也包含了对井冈山斗争经验的总结与提炼。与1927年11月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严厉批评秋收起义并给予毛泽东处分相比，中央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斯大林对毛泽东的认识也从此深刻起来。



图一七 中共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章》修订油印稿

1928年7月10日，大会选举中央委员，经米夫亲自提名，缺席的毛泽东当选中共中央第六届委员，在23名中央委员中得票数排第12位。

出乎大家意料的还有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湖南代表陈永清回忆说，当时有人在私下议论：“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是因为他有枪杆子和井冈山”，“向忠发当选是因为他有工人阶级的金字招牌。”^[41]

3. 布哈林、米夫保驾，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

在斯大林、布哈林、米夫等人看来，中国大革命之所以失败，失败之后之所以继续发生瞿秋白的盲动错误，根本原因是中国党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影响，决心通过中共六大全面改造中国党的领导机关，把工人阶级出身的革命者推举到最高领袖的地位上来，使中国党的领导权真正保持在无产阶级手中。种种迹象表明，中共六大召开之前，斯大林、布哈林和米夫已经内定向忠发为中国党最高领导人。但是，向忠发自己并没有想到自己会如此轻易地一步登天。

1928年6月15日，即中共六大开幕前三天，布哈林召集六大部分代表进行政治谈话会，在周恩来、王若飞、张国焘、蔡和森、何资琛、项英、李立三、黄平、关向应、甘卓棠等人讲完之后，有的还不止一次发言，向忠发才很自谦地说：“（1）我离国很久，对很多实际情况缺乏了解。（2）我对于党的认识浅，正是斯大林同志所说，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眼光。”^[42]接着，他谈了两个没有深刻见地的问题。

但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米夫的操控下，在6月17日分发的由共产国际审定的会议日程安排上，向忠发被明确指定为六大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通常情况下，开幕式和闭幕式的主持人由现任党的第二把手担任。

将向忠发安排为开幕式主持人，起初大家还以为是一种荣誉性质的会议职务，充其量向忠发会在中共中央的地位有所提高，根本想不到向忠发会通过这次大会出任党的总书记。

但向忠发似乎嗅到了某些气息，在会议上表现得异常活跃。他既大力批评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又向瞿秋白“盲动主义错误”猛烈开火，很快成为会上的焦点人物。他紧紧追随米夫，表现出一种坚决拥护和贯彻共产国际路线的姿态，通常在讲话后表示“这就是正确的国际路线”，被张国焘讥讽浑身充满了“米夫味”。而会议中的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等人，因为观点不同，立场不同，动不动就在会上吵起来。尤其是瞿秋白和张国焘之间，争吵最烈，势如水火。始终驻会的米夫，曾经疾言厉色地训斥瞿秋白和张国焘：“就是你们这两个大知识分子在吵架，再吵就把工人干部提拔起来代替你们。”^[43]

即便如此，大会代表依然想不到向忠发会担任党的总书记，许多代表甚至想到了“取中间路线”的周恩来是个不错的人选。然而，到7月10日，即选举中央委员的前一天，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经与瞿秋白等人协商后，正式提出了中央委员候选名单，在36人的名单里，工人出身的22个，向忠发的名字被排在了第一名。宣读后一致通过。这时，大会代表终于完全了解共产国际的意图了。经过选举，36名候选人中选出中央委员23人，候补中央委员13人。由于米夫重点推荐，向忠发和毛泽东都高票当选中共中央委员。经过再次选举，产生了14名候选政治局委员。

7月19日召开六届一中全会，选举新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布哈林、米夫等人认为这是一件大事，必须亲自参加。14名候选政治局委员名单中，向忠发不仅名列第一，还被确定为会议主席。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推举向忠发为总书记的信号。会议开始，米夫首先讲话，说明会议主要任务是选举政治局和党的主要负责人，要求“同志们个个站在党的利益方面，以同志的态度互相帮助”。同时指出“选举留在国际党代表的只消两名有经验的同志，最好是秋白和国焘”^[44]。把瞿秋白和张国焘留在莫斯科，一来排除了他们二人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资格，二来可以为向忠发当选总书记后开展工作消除障碍。

随后，米夫提出一张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7人名单，即向忠发、瞿秋白、张国焘、周恩来、蔡和森、李立三、项英。接着米夫表示：这个提名是共产国际经过慎重考虑而决定的。在各个委员不愿引起新的辩论的情形下，米夫这个提议无异议地通过，关向应、李立三、罗登贤、彭湃、杨殷、卢福坦、徐锡根等另外7人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接着进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选举，因为瞿秋白、张国焘已经确定留在莫斯科，政治局常委自然落选，按照得票多少顺序，苏兆征、向忠发、项英、周恩来、蔡和森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李立三、杨殷、徐锡根当选为政治局常委会候补委员。

当日，在米夫主持下，提名向忠发、周恩来为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人选。米夫进一步提议说：共产国际认为最好由向忠发任书记。选举结果，向忠发当选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兼中央常委主席。

于是，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在布哈林、米夫保驾下，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工人出身的“总书记”。

20日，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央组织机构的设置和常委的分工。向忠发负总责，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蔡和森任宣传部长，杨殷任军事部长，苏兆征任工委书记，李立三任农委书记，张金保任妇委书记。

因为周恩来任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所以，此后中共中央工作实际大多数都由周恩来

主持。在政治局会议上，向忠发通常说：恩来同志的意见，就是我的意见。

在中共六大上，对于观点、立场严重对立的瞿秋白、张国焘、王若飞三人，斯大林和共产国际都认为，此三人继续留在中共中央工作，有造成中共内部分裂的危险，于是决定将此三人留在莫斯科，让周恩来和中共中央其他新领导人回国，协助向忠发这个工人出身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开展工作。

七 中共六大的历史地位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党在城市和农村革命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中国共产党重新整集队伍，在新形势下探索革命道路，开始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历史重要转折时刻召开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

六大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批判了陈独秀的右倾主义和瞿秋白“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对有关中国革命的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根本问题，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它集中解决了当时困扰党的两大问题：一是在中国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问题上，指出现阶段的中国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引起中国革命的基本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现阶段的中国革命依然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主义革命。二是在革命形势和党的任务问题上，明确了革命处于低潮，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党的中心工作不是千方百计地组织暴动，而是做艰苦的群众工作，积蓄力量。这两个重要问题的解决，基本上统一了全党思想，对克服党内存在的“左”倾情绪，实现工作的转变，起了积极的作用。

由于历史发展的局限性，六大对中国革命的特点、中国革命的中心问题、中国革命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等问题认识不足，认为民族资产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党的工作重心仍在在城市，革命虽然处于低潮，但高潮很快到来。尽管六大存在上述种种不足，但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这种正确性与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布哈林、米夫对六大的正确引导和指导是分不开的。

但是，六大在一些方面对中国革命的发展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

第一，中共六大修订了党章，再次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此后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共都被迫事事听命于共产国际，造成很多的政策失误，给中国革命造成很多危害。

第二，在布哈林、米夫操控下，让理论水平不高、工作能力不强的工人出身的向忠发做了党的最高领导人，这是组织工作上的一大原则性的错误。周恩来说“‘六大’是有原则性的错误，对以后发生了坏的影响”，指的就是这个事情^[45]。

第三，在六大过程中，作为翻译和列席代表的陈绍禹（王明）、沈泽民等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和向忠发一起追随米夫，被称为“米夫派”，他们一方面利用向忠发放大炮，批评瞿秋白、张国焘等临时中央领导人，一方面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似乎今后党领导革命的重任要由他们来承担了。在筹备选举中央委员的会上，米夫说，中国党负责人理论上很弱，现在有些较强的同志，如陈绍禹、沈泽民等，暗示可以提拔他们参加中央；同时会上传出米夫要提拔这两人当中央委员^[46]，引起瞿秋白、张国焘、罗章龙、周恩来等人的不满。但自此王明在莫斯科更是以百分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在米夫的器重下，在留学生中声望日高，为日后共产国际将王明派回国担任中共中央最高领导人，埋下了伏笔，创造了条件。

中共六大召开，正是大革命惨遭失败之时，党在城市和农村的力量遭到毁灭性打击，每天都有革命志士被杀害，全国到处腥风血雨，似乎看不到胜利的希望。当此之时，中国共产党成立不足7年，瞿秋白、周恩来、张国焘、蔡和森、邓中夏、李维汉、李立三、王若飞等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年龄最长者邓中夏34岁，最小者瞿秋白、李立三只有29岁。面对严峻的革命形势，面对随时被捕被杀害的危险，他们没有畏惧，没有退缩，他们以满腔热血挺身而出，重新整集队伍，拿起武器，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领导残存的中共党员，挑起继续革命的历史重担，把革命斗争坚持下来，继续下去，这是对中国革命非常了不起的贡献。仅此一点，就足以令今天的我们对他们肃然起敬。

同时，在那种历史大变动的年代，革命形势瞬息万变，许多陌生而复杂的问题突然摆在他们面前，等着他们去回答，去解决。而当时中国革命的理论准备和实际斗争经验都非常有限，许多问题在刚产生时并不那么清晰，在发展中也包含着许多难以捉摸的不确定性，在严酷的革命形势下留给他们思考的时间非常紧迫，要立刻作出准确的判断和选择，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许多在现在看来似乎十分简单的道理，他们却往往要在付出巨大代价后才能把它看清。所以，在那样艰难的条件下，血气方刚、年纪轻轻的他们，在革命探索中，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但是，不管出现过失误还是没有出现过失误，他们对中国革命的探索都作出了不可抹煞的贡献。

中共六大当选的中共中央重要领导人，杨殷一年后，蔡和森三年后，邓中夏五年后，瞿秋白七年后，分别被国民党抓捕杀害。

中国共产党就是这样在不屈不挠的斗争中，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

注释：

- [1] 李维汉：《对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的回忆与研究》，《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 [2] 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11年，第233页。
- [3] 原载《中央通讯》第2期，转引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档案文献选编》上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15年，第3页。以下简称《六大档案文献选编》。
- [4] 原载《中央通讯》第13期，转引自《六大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5页。
- [5] 《项英等提议中央六大前征求各地意见的信》，转引自《六大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6页。
- [6]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334页。
- [7]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之《回顾党的六大前后》，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第241页。
- [8][13] 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85页。
- [9]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二册，东方出版社，1991年，第366—367页。
- [10] 参见任建树《陈独秀传》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423页。
- [11] 陈永清：《参加中共六大前后》，载中央党史研究室编《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中共党史出版社，2014年，第99页。以下均简称《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
- [12] 房维中、金冲及编《李富春传》，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第75页。
- [14] 唐宏经：《赴莫斯科参加中共“六大”》，载《亲历重大历史事件实录》第1卷，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第422—423页。
- [15] 黎国忠：《忆广州的革命斗争和参加中共六大》，《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第7—8页。
- [16] 丁基实：《参加中共六大的回忆》，《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第106页。
- [17] 黄平：《出席六大》，《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第31页。

- [18] 王翹：《有关中共六大的实况》，《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第86页。
- [19] 杨之华：《在哈尔滨护送六大代表的回忆》，《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第90页。
- [20] 罗章龙：《参加中共六大》，《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第49页。
- [21] 邓颖超：《一次遇险与脱险的经过》，《人民日报》1985年8月14日。
- [22] 唐韵超：《中共六大代表话当年》，刘影整理，《百年潮》2001年第6期。
- [23] 中共哈尔滨市委党史研究室：《哈尔滨与红色之路》，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73页。
- [24] 龚饮冰：《回忆接待六大代表》，《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第1页。
- [25] 陈铁健：《从书生到领袖——瞿秋白》，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40页。
- [26]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七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215页。
- [27] 姜建中：《评向忠发给共产国际的两封信》，《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年第11期。
- [28] [美] 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第211—212页。
- [29] 《周恩来对斯大林同瞿秋白和中共其他领导人会见情况的记录》，《六大档案文献选编》上卷，第42—44页。
- [30][34] 李立三《在六大上》，《中共六大代表回忆录》，第30页。
- [31] 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94页。
- [32] 同[8]，第181页。
- [33] 同[9]，第380页。
- [35] 同[9]，第381页。
- [36] 李培之：《飞度关山的人——回忆王若飞同志》，《人民日报》1982年4月8日。
- [37] 《选举结束后的讨论》（1928年7月10日），《六大档案文献选编》下卷，第839—841页。
- [38]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240—241页。
- [39] 《李维汉给中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1928年5月25日），载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译《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27—1931）》第7辑，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458—461页。
- [40] 同[38]，第244页。
- [41] 同[11]，第100页。
- [42] 周恩来：《六大代表政治谈话会的材料》（1928年6月），《六大文献选编》上卷，第103页。
- [43] 同[8]，第181页。
- [44] 《布哈林在中共六届一中全会上的讲话》，载《文献选编》下卷，第842—843页。
- [45] 同[8]，第186—187页。
- [46] 同[8]，第184页。

（责任编辑：崔名芳）